

附件：

《贵州社会科学文摘》参考模板

1. **标题：** x x x x x
2. **概述：** 成果思路、方法、框架、发表或出版、总字数等。（300 字左右）
3. **摘要：** 成果正文的摘要。（著作 2000 字左右、论文 1000 字左右、报告 1500 字左右）
4. **文末标明：** 作者姓名、单位、职称或职务

学术专著模板：

战国秦汉时期南夷社会考古学研究

本著作于2019年7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全文30万字。2023年11月获贵州省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运用了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法，文化人类学和民族考古学理论方法，以及社会学结构理论和文化变迁理论等研究方法。全书共有7个部分组成。从最初写作到正式出版，经历了10多年时间，期间以“黔西滇东战国秦汉时期考古遗存综合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0XKG002），这是贵州省第一个考古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过继续深入研究，结项成果获得良好等次。

一、“南夷”释义及其考古研究新思路

（一）“南夷”释义。汉代的“南夷”，既是地域概念，也是文化和民族意义上的概念，是地域、文化和民族三者的综合体。“南夷”地区包括西汉时的犍为郡南部、牂牁郡大部 and 益州郡东北部，大致在今四川宜宾以南、云南文山以北，贵州西部（贵阳、遵义、都匀以西）至云南曲靖及其相邻地带。“南夷”是汉人尤其是其上层精英人物从当时汉朝的疆域形势出发，对本区域复杂社会文化、多民族群体及其关系、历史发展变迁及其历史地位的综合把握，反映了汉人对战国秦汉时期南夷这个特定历史文化区的认知水平和统治策略。

(二)“南夷”社会考古学研究新思路。把战国至东汉晚期的文化遗存分为两类，即土著文化遗存和汉移民文化遗存，运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法，从时代、文化内涵、演变等方面分别讨论其类型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史书记载和民族志资料进行文化个案分析，解析重要的遗存现象和文化内涵。再借鉴有关文明化进程、族群、文化变迁、文化类型、文化互动与社会整合的理论方法，探讨整个南夷社会文化格局及其变迁的过程、模式、原因。

二、南夷地区战国中晚期至东汉初期土著社会文化内涵与文明化进程的特点

(一)各区域土著社会文化在特定共性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多样性和独立性。特定共性表现为：墓葬都为土坑竖穴式，小区域内相对集中分布，规模小，随葬品普遍贫乏；基本经济生活为“耕田，有邑聚”；青铜冶炼和制作技术系统相同；各土著社会处在大致相同的发展层次，经历了相似的演变阶段，即战国中晚期、战国末期至西汉前期、西汉中晚期和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四个连续的发展阶段。这样的共性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文化模式，即建立在相似自然地理环境基础上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心理特质和社会组织结构。与此同时，各区域文化又具有多样性和独立性。中水类型、可乐类型、八塔台文化、铜鼓山类型、泸西石洞村与大逸圃遗存等并列发展，是其中比较重要的独立性很强的区域性文化。造成这种文化多样性和独立性的原因，一方面是自然地理区隔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是各自文化内部的发展缓慢

交流不足，无力也不太需要超越自然地理的局限。

（二）土著社会在缓慢发展中形成了特定的文明化进程模式，即基于生存的开放——融合模式。青铜技术精细化发展的方向是改进社会民众的生存方式，没有在战争武器和制度性礼器方向上取得进展。土著社会不断吸收巴蜀文化和石寨山文化的剑、戈、锄以及中原文化的漆器、铁器，改进各种用具的形态和装饰风格，采用铜铁合制技术等。战国晚期以庄蹻为首的楚众入夜郎“王夜郎”，在原生土著文化基础上，注入了独特的楚文化因素，在土著王权社会基础上，加入外来王权思想观念。在社会结构和风习信仰方面，民间社会中没有规范强制性力量存在。“俗好鬼巫，多禁忌”之风尚、“少威棱，多懦弱”之性格、生死相依之血缘纽带关系、“皆椎髻”及好穿戴之服饰等，这些都没有权力、制度和上层文化的导化，而是民间自然认同的结果。

三、南夷社会形成的社会发展模式

（一）郡县制度下的“夷”汉共处机制形成。从汉武帝开拓西南夷至东汉晚期，汉移民一般从四川盆地分别从西边顺着横江流域，从东边沿着赤水河南下，与土著和平共处，毗邻而居而葬。汉王朝设置牂牁郡及其十七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各区域土著社会政治和文化之间难以超越自然地理环境局限的局面，加强了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之间的联系，较快地推进了南夷社会格局的变迁。汉人在南夷地区建立了一个不同于母体，更能够适应地方的新社会，表明汉移民社会内部的协调机制比较完善。它满足了汉文化与土著文

化近距离接触，长期和平交流互动的需要，更具有生命力和新内涵。因此，除了与整个汉文化保持统一性外，还形成了新的地方传统。

（二）基于汉移民及其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化、族体三位一体的新社会文化变迁模式形成。南夷土著社会的开放性与相对落后性，注定汉文化要发挥促进其进步的主导作用。汉人进入后，夷汉之间不断磨合，发展形成了一种基于汉移民及其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化、族体三位一体的社会文化变迁模式。即汉人迁入并直接输入汉式经济、政治、文化，土著以开放心态吸收外来文化，汉人也吸收一定土著文化。汉人在土著社会文化的基础上，依赖并借助于土著，通过郡县制对南夷社会的结构重建是成功的，在政治和民族关系上由“郡国并治”向“郡姓一统”不断推进。双方通过互动整合，重新构筑出适合夷汉需要的更大范围的社会、政治、军事、文化活动空间和复杂社会结构。

（三）以汉武帝开拓西南夷和汉移民进入为时间界限，南夷社会文化变迁与文明化进程经历了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第一阶段为土著主导的基于生存的开放——融合式发展阶段，体现为土著社会文化内部的浅层次发展、各区域之间的并列发展和周边强势文化驱动发展。第二阶段基本特点可概括为夷汉政治、经济文化、族体三位一体融合式发展，表现为：土著上层与汉廷、土著民众与汉移民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和族体方面的顺应式互动与互补性整合；汉人（官吏、大姓和移民）主导、土著参与的南夷社会

秩序认同性整合不断完善；夷汉上层（郡县官吏和大姓）合作共谋，政治离心力加强，与中央政权保持半独立状态；不同社会成员或群体在汉式共同的文化心理、价值理念和利益指引下，凝聚为既根植中华母体，又立足贵州高原的新社会整体。但总体而言，南夷社会一直都存在对外界社会经济文化的依赖，早期依赖周边的滇池区域、四川盆地的青铜技术和器物，晚期主要依赖寄生于四川盆地的汉文化。南夷社会内生性发展动力不足，主要依靠外在强大文化的驱动发展。可以认为，没有外来文化和移民的参与和刺激，南夷社会很难有真正的发展。

（作者：叶成勇，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省史学会副会长，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副院长）

论文模板：

规模性返贫风险因素、类型及其政策启示

——基于西南地区的调查

本论文基于对返贫风险与可持续发展逻辑关系的分析，构建涵盖“经济—社会—自然”三个层面的衡量规模性返贫风险因素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实地发放问卷和现场访谈的方式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村民进行随机走访调查，最终共获得 1185 份有效问卷。结合调查问卷的数据特征和已有关于返贫风险的研究方法，选取综合度量模型、贡献度模型以及最小方差模型，对规模性返贫风险程度、因素和类型进行分析，形成相关结论。本论文发表于《管理世界》2022 年第 11 期，全文约 14000 字，获贵州省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一等奖。

第一，规模性返贫风险程度分布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态势，表明西南民族地区脱贫后仍存在诸如产业基础不夯实、自然环境恶劣和群众发展意识薄弱等不稳定因素，导致在集中性脱贫后容易再次返回贫困线以下。第二，基于贡献度模型计算结果，西南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因素的次序为：产业因素 > 能力因素 > 经济因素 > 政策因素 > 自然因素 > 文化因素 > 家庭因素，表明产业因素是形成西南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的最主要原因。第三，根据最小方差模型，规模性返贫风险类型可划分为单风险、双风险、三

风险、四风险、五风险、六风险和七风险返贫型 7 种，但西南民族地区七风险返贫型的方差最小，即最接近于规模性返贫风险类型的理论模型，表明其规模性返贫风险由多种因素综合构成。

基于文章研究结论发现的规模性返贫风险因素存在的矛盾及其类型，防止规模性返贫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本文从建立产业防线、重视能力提升、筑牢经济基础、优化政策体系、明确返贫风险、建设反贫文化、强化帮扶职责等七个方面提出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政策启示。

（作者：赵普，贵州财经大学大党委副书记、校长、教授、硕士生导师；龙泽美，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超，贵州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调研报告模板：

新形势下我省农民合作社避免空壳化 实现提质增效发展的对策建议

本调研报告系 2021 年度贵州省理论创新课题(委托课题)《新形势下我省农民合作社避免空壳化实现提质增效发展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获贵州省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研究报告类)一等奖，原文 5700 余字，被《贵州调研》2021 年第 12 期全文转载，收录于中共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 2021 年优秀调研成果汇编《调研·开新篇》，本文获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批示后，有关意见建议被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采用，成为推动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具体举措。

一、农民合作社空壳化的表现

(一)合作社“有名无实”。指合作社没有农民实际参与，其办社注册和运营管理由村委干部包办，注册资本金主要源于脱贫攻坚中各项补贴，管理运营主要为村干部，理事会与社员没有实际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具体表现为：有的合作社由村委包办，市场化程度低，依靠项目资金兜底。有的合作社业务由平台公司包办，年底象征性分红，实际生产无农民参与。

(二)合作社“名不副实”。合作社是农户劳动的联合，农民社员才是合作社的主体。名不副实型空壳社指所有者与

惠顾者不一致，没有真正践行互助合作的本质，其“名声”与实际不符的农民合作社。这类合作社徒有虚名，具体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没有践行互助合作本质，以“套取财政补贴”“包揽农业农村建设项目”为动机的空壳社。二是农民社员丧失主体地位，理事独大，民主管理、互助共享浮于表面。

（三）合作社“周期休眠”。是指合作社由于产业选择不合理、运营管理不科学、市场能力弱导致合作社难以为继或者周期休眠的现象。这类合作社具体表现为：有的合作社组织架构松散，管理不当、缺乏人才和技术，可持续发展难。有的合作社缺乏合理分配机制，因分配矛盾或动力不足发展停滞。有的合作社生产时有时无，习惯性出现经营休眠期。这类难以为继的农民合作是因为在资本、市场、人才、制度等生产要素上存在困难，导致发展不可持续。

二、促进农民合作社办社质量提升的对策

（一）持续清理和规范空壳社。常态化开展农民合作社清理退出和规范提升行动，加强对各类农民合作社的甄别分类、动态监管，推动建立合作社清理退出机制和规范提升机制。一是对应该注销退出的，通过区分自愿申请注销、劝导注销和强制注销等不同情况，开辟相应渠道，简化注销程序，适时予以注销。二是对需要规范经营的农民合作社，市监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指导推动农民合作社严格执行年报制度，做到规范运行。

（二）坚持“小切口”施策。一是完善组织架构，解决

因不善管理而导致的空壳化。一是发挥“组管委”服务生产、治理乡村的积极作用，降低村级的管理成本，实现村民组与专业社融合发展。二是合理分工，区分“村务”“社务”，破除村务社务一把抓的问题。三是探索建立财务指导员制度，从银行、信用社以及当地财会专业大学生中挑选财务指导员，指导合作社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培训财务人员。二是攻克技术屏障，消除因技术缺乏而导致的空壳化。探索技术辅导员制度，鼓励农业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担任技术辅导员，帮助合作社优化产业布局、指导生产技术、培训服务技能。以县为单位购买技术服务，为全县合作社提供技术指导，解决育苗（种）、生产、加工环节的技术难题。加强技术培训。组织当地职业技术学校教师、农技专家进村入社，开办技术培训班，领建示范大棚、农场等。三是强化利益联结，避免因动力不足而导致的空壳化。合理设置股权。设置惠及社员和村集体的“存量股”，满足管理需要的“管理股”，服务于绩效考核的“变量股”。完善合作社分配制度，保障社员共享产业发展红利，确保各方公平受益。落实奖惩机制，对善于开展经营管理和生产销售的社员进行奖励，对违反村规民约、生产规范的社员予以适当处罚，提高管理效率。四是突出能人带动，解决因缺乏人才而导致的空壳化。激励引导“领头雁”“新青年”返乡创业，培育治社接班人，充实合作社人力要素。鼓励引导待业大学生参与合作社经营，让合作社成为青年成才的新职场。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建立长效培养“三农”人才的机制，培

养适用型技术人才。

（三）加强政策保障。一是贯彻落实支农惠农强农政策，着力推动优惠政策落地生根。二是探索合作社特派员制度，负责政策咨询、组织培训、沟通协调等工作。三是坚持“试点开路、示范引路”，完善示范社评定指标体系，持续开展示范社创建。加大对示范社的宣传表彰，及时做好经验总结，组织学习观摩，发挥引领作用。四是着力建设全省合作社数据中心，搭建省级信息交流平台，建立信息录入和共享机制，为出台支持政策提供参考。五是建立省级农民合作社信用档案系统，健全信用管理机制，对信用良好的农民合作社在示范社评定和政策扶持方面予以倾斜。

（作者：魏明禄，黔南州政协主席；李思贤，黔南州政协；吴钧，中共黔南州委党校；陈践践，黔南州文联）